

北碚文史资料

第一期

陶行知在北碚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编
北碚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次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致育才学校的信 陶行知 (1)

陶行知先生在北碚 卢子英 (4)

我和陶行知在北碚 高士其 (9)

我与行知在北碚 吴树琴 (12)

忆陶行知先生和育才学校

——北碚草街子生活散记 叶 宇 (17)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杨秉孙 (27)

育才之友——农村工作干部见习班 胡晓风等 (30)

育才好比一盏灯 甘烈君 (34)

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 李 任 (40)

陶行知与私立北泉小学 成国超 (43)

北温泉的游泳课 章 恒 (47)

火的故事 帅士熙 (49)

——记陶先生在北温泉的一次演讲

草街人民忆陶师 张竟成等 (52)

古庙就是新天地 江韵辉 (57)

——忆育才的学习与生活

于平凡中见伟大 因 苗 (62)

——陶师轶事散记

回忆行知师二三事 夏志成 (67)

忆育才 念陶师 炼 虹 (69)

陶行知谈美	高 嘉(78)
陶行知先生谈学习外语	李 任(80)
三点回忆	赵义熙 苏永进(84)
沥尽心血培育人才	张再为(92)
放鞭炮	裴未如(101)
燃香计时与躲不脱	程代辉(104)
“抗敌儿童画展”	宋 融(107)
——忆育才学校绘画组的首次画展	
育才的舞蹈活动	吴 艺(112)
一朵鲜红的石榴花——《榴火》	高 嘉(115)
育才生活片断	杨维至(117)
深入研究陶行知 开创教育新局面	张达扬(121)
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	吴树琴(135)
陶行知教育思想及其体系初探	戴续威(141)
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刘子林(163)
——陶先生教育思想管窥	
陶行知在北碚综述	李壹华(168)
编后记	(188)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致育才学校的信

陶 行 知

肖生竹因宁远及全体同志：

关于校舍问题，我有以下的考虑。这个问题摆在我心里几个月，现在想通了，可以画出正确的路线。也如同去年春天育才办不办的问题，在四月六日早晨想过之后就一直支持到现在而还有发展之可能。凡是要想通了才有力量，现在后方的人往往为了一点小事争意气弄字 纠缠磨擦，消耗精神，把我们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放在脑后，自从香港失守，新嘉坡沦陷，缅甸紧急，我们是要更加精诚团结以克服倍上加倍的艰难。大敌当前，凡属同胞都应放弃蛮触之争，解放出全副力量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庙之争正是微乎其微的小事。为着要对大目的努更大之力，双方都应该让步，让到可以合作的地步。从前我们让到拨借大间屋而张君敦廉还不肯承认本校合法租佃而通融，这是他的过分处。如今他写了义借之信，我们还连善堂之绘画室也不肯让，仔细一想，这确是过分了，固然，我们是依法的手续租了古圣寺和一部份善堂，在法律上，我们是站得住。但是假使没有育才学校之租佃，中心学校实际上是可以一举手之劳而得到冠冕堂皇之校舍。实际上我们是多少给了中心学校一点阻碍。我们究竟是客人。虽然在主观上我们绝不愿喧宾夺主，但是客观上也实在给了本地办学的朋友相当的不方便。我在去年九月二十七日对全体宣布的政策，检

讨之下，还是正确的。只要真正于当地儿童有益，我们就让出整个学校，自己露天过活，也是心甘情愿。我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们入川，几乎是一无所有。就是这所古庙也是普学通桂法师，他们的徒弟和施主所造，我们虽然是出些租钱，但几乎是坐享其成。让一点给本地的朋友和小朋友也是应该的。晓庄是从四个帐篷办起办到卅个茅蓬那才是创造。山海工学团虽然办了二十五里的普及教育和发动了全国的普及教育运动却连一个茅蓬也没有造，也没有堂皇的古庙给我们享受，那也是真正的创造，老实说，如果地方的朋友要整个的古圣寺，我们也丝毫不留恋的让给他们。那样我们再来住住帐篷过过野人生活则赛翁失马未知非福。我们自从中秋以后走的是一庙一校之路线，这路线当然是正确的。假使本地的朋友没有成见或意气，那是可以行得通，而且是双方都好。但是人为情感所限，一时不能看清这路线之正确势不能甘心情愿的接受。我们一定要用上层的力量和法律的手续来维持一庙一校当然是可以，但是若不作适当的让步则各走极端，必定费力费时费钱而或者要弄到两败俱伤，徒然牺牲了小孩反放松了大敌。因此善堂中之绘画室我们决不参加诉讼，可以用调人之态度商让与中心小学。如果他们还不够，可以再将高级班之课室借与他们。方针如此，具体办法，静气会商定之，我也不要机械的提出。望大家灵活运用这方针而为两校造福。

楚材来信，教部即有视学来，望善为招待。

师荒问题已解决：

（一）谭莹同志已允来，旅费已汇去。

（二）自然科学教师请到两位一是潘新同志，江苏人南开大学毕业，二是于宣力同志湖北人大同大学毕业，潘先生

数日内即来。

(二) 音乐指导委员会巫一舟夏之秋二同志四月来，黎国全同志轰炸期来。

(四) 戏剧指导委员会拟请苏怡先生先来。金山同志于屈原演毕后，大概四月中旬可来。吴晓邦先生夫妇亦拟来一时期。

(五) 社会组杨先生决来，意林同志当有面告。

经费已枯，此地只余数千元，现拟用最大之努力于四月六日前，找二十位朋友筹足二十万立案十万渡日以纪念集体武训节。

戏剧组提出鞋的问题，很好，现在方针稍有变更。这便是以后提出之互助原则，对无父母亲友之同学，动员学校师生力量尽先补助。音乐组之鞋袜等于化装，希望谅解，女生请发裙布，正在向保育会交涉，俟蒋夫人批准，便可，否则另想办法，有月病之女生加发草纸两刀由意林同志核发。

敬祝
康 健！

行知

三一、三、廿二、

陶行知先生在北碚

卢子英

陶行知先生是我的恩师，是旧社会北碚人民的恩人，亲人罗！他的伟大，我是不能用文字或语言来表达清楚的，可惜哟，当代一位大师被埋没了，被埋没了啊！

我敬仰陶行知先生，远在他一九二七年于南京创办晓庄师范的时候。

一九三四年，我和二哥作孚去参观他在上海创办的山海工学团时，才有幸面聆教益。

一九三九年春，陶行知先生是满怀民族义愤，来到大后方而在北碚定居的，先住在北碚公园的清凉亭，后因敌机轰炸，才迁居北碚檀香山桥一个小小的土碉堡内，同时带来了灾区一些难童寄住于北碚民教馆内。后来这些难童都成了他亲手创办的培养新中国革命人才的摇蓝——育才学校的学生，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冬，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决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去上海从事革命斗争，才离开北碚的。

陶行知先生一生，酷爱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他以毕生精力，从事教育改革，在教育方面对人民的贡献尤为巨大，永不磨灭。党和毛主席称陶行知先生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我认为陶行知先生应是当之无愧的。

—

陶行知先生发明的“小先生制”——即知即传的教育方法，曾为北碚广大群众增加了幸福，早在一九三六年，北碚就采用了他的“小先生制”来扫除文盲，当时给小先生教学提的口号是：“我们的工作——即知即传；我们的训练——用脑用手；我们的精神——愈难愈前”。待一九三九年春陶行知先生来到北碚时，北碚的小先生已发展到一千多人，传习学友已近三千人了。他作的《锄头舞歌》也广为传唱。

当时北碚全区五百多位公教人员，激情满怀，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我还听见了《锄头歌》的歌声，了解了一千多小先生的传习活动，我又似乎回到了山海工学团……”当年他又惠赠了他的旧作《古庙敲钟录》给我。拜读后，深受教育，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小孩真不小，应将小学教育与民众教育密切结合起来，方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此后，北碚民众教育在陶行知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记得陶先生创立的“小先生制”，当时已被推广到全国的二十三个省市，并在东南亚一带得到推行。这对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起了重大作用。今天要彻底扫除我国现有的文盲，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这种方法仍是值得借鉴的。

—
二

国难当前，陶行知先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他热爱人民，相信人民，坚决反对反动政府靠拉壮丁来补充兵源，他极力主张做好宣传，做好优抚工作，叫人自愿当兵，叫家属支持当兵。我在他的热情帮助下，在北碚发起了自愿兵运动。

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旬，北碚组织了公教人员和中学生共三千多人的宣传团体，分赴乡、村动员宣传，不到半月时间，自愿报名参军的达四百余人。五月初，北碚举行公宴，慰劳志愿兵及其家属，为他们披红、戴花、献旗、摄影。陶先生又发起了志愿兵捐献运动，他当时经济非常困难，也认捐了五十元作倡导。并以《敬告后方同胞》为题，赋诗一首：“志愿战士可钦佩，打得东洋如潮退。……若想不当亡国奴，快快出来出保险费。”以后发展为志愿兵月捐运动，直到抗战胜利，这就使志愿兵家属的生活有了保证。

第一批志愿兵在古圣寺整训时，我陪陶先生率领他招来的“七·七少年剧团”前往慰问。他作了激昂的演说后，即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一首献给志愿战士：“志愿战士了不得，以一当十，十当百……”这给志愿兵以极大的鼓舞。

五月下旬，志愿兵整装乘轮出发之际，陶先生同大家一道，亲自到嘉陵江边送别，一再叮嘱志愿兵战士要保护身体健康，要团结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又多次向送行的人说：要十分关心志愿兵家属的生活，今后要努力三次、四次地送志愿兵到前方去。

陶行知先生这些感人的行动，给志愿兵以巨大的鼓舞，也给志愿兵家属极大的安慰。

在抗战时期，北碚在陶先生热情帮助下，对前线兵源的补充，基本上没有拉一兵一卒，而是自愿从军到前方抗击日寇。这是陶先生对抗战、对北碚地方又一巨大贡献。他也曾

就北碚志愿兵运动的情况写了八篇资料，当时周恩来同志阅后交由政治部（当时国共合作，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印发各地，大加提倡。

三

陶行知先生亲自创办的，直属中共央南方局领导的育才学校，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北温泉开学了，接着便陆续迁往古圣寺。

这所培养人才幼苗的新型学校，成为蒋管区的民主堡垒，蜚声中外，因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办学极为艰难，他一天既忙于国事，作抗日救国活动，又忙于育才学校事宜，特别是三九年到四一年，敌机狂轰烂炸时期，他更疲于奔命。经常来往于黄桷、文星、朝阳……等乡镇，轰炸之后，他又共同去慰问受灾者，无论是寒暑亦在所不辞。

陶先生常常是拖着极度疲乏的身体，趁午饭后或夜间来我家商谈学校和抗战有关事宜。有时，事关紧急，需在上班时相商，为避免反动派猜疑，便通过家人把我叫回家中商谈。特别使我难忘的，他常与我谈到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时，总是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国建国。并以当时苏联突飞猛进的事实作例证，使我深受教育，得益非浅，顿时使我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满怀信心。

一九四一年春，当时被视为禁书的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刚一出版，他即秘密送我一本。这书使我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中国光明的未来，明确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它好比黑夜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这件事是使我终身难忘的。

一四四年，陶先生还惠赠了我一本他自己编著的《育才学校手册》，其中有“创造宣言”一篇，开头就是：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这句话真是动人心弦，发人深思。这篇“宣言”我们在北碚管理局职工大会上朗读过，大家深为感动，很受鼓舞。

四

陶行知先生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近七年之久，在北碚作过多次讲演，他创办的红色的育才学校，在北碚作过多次的革命戏剧演出，多方面留下了光辉的业绩。特别是陶先生对北碚教育改革，促进抗战方面作出了不可估量的扶持，北碚人民永远崇敬他，永远怀念他！

陶先生生前常常笑着对我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则奋斗应为成功之父。”他的确为了人民教育事业，为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英勇奋斗了一生，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增添了无上光荣，他真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和“万世师表”，他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今年一月五日到十日，有十个省市的代表在重庆举行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我闻讯后，感到万分高兴，的确我们今天应当大力宣传陶行知，认真学习陶行知，也应当以陶为师，改革教育，振兴中华。

一月十一日上午，陶夫人吴树琴同志和陶师的二儿晓光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亲自到我家中来看望我，一见面真是比亲人还要亲啊！内心的喜悦，的确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我和陶行知在北碚

高士其

陶行知先生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

解放前，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他和我交往非常密切，我曾和他一起生活过一年多，他很关心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我走上科普创作的道路就是受他献身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精神的鼓舞，下面是我在北碚时期的一段回忆。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从延安到了重庆，由于日本飞机空袭频繁，八路军办事处把我送北碚去暂居。

那时候我和汪伦同志一家同住在——陈宅大院里。

有一天，我在房间里阅书，忽然有一个穿蓝布长袍的人抱着一个大西瓜走进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陶先生。他从董必武同志处得知我新来到北碚。

我们回顾了上海别后的情景，他劝我这个不能走动的残疾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敌机无情地轰炸重庆的时候，没有必要长留在不安全的地方，还是走为上策，他将为我募捐一

当晚，陶夫人和晓光同志临时决定，要离别重庆乘轮东下，晚间又专程来我家辞行，陶行知先生的精神已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来了。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陶行知先生精神不死！永放光辉！

笔旅费送我到香港去治疗，我告诉他在延安的时候，组织上也有这个想法。这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托他的秘书夏云同志转告我的。据说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

第二天，陶先生又来看我说：这笔款已经有着落了，我不久即可成行。

第三天，他约我和汪伦同志坐滑杆到北碚区公所拜访卢子英区长，他身穿绿色军装，年纪四十来岁，瘦长个子，褐色的面容看来很强壮结实，他请我们入内就坐，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南面靠窗有办公桌、靠背椅、长沙发，北面有长方形的食桌和一排椅子，办公桌上放着闹钟、文具、公文袋、茶具和几张报纸，我因行动不便不能站立，只能斜坐在沙发上，子英从另一个房间里拿一个白色枕头给我靠，我非常感谢。

一会儿，陶行知先生也应约而来了。他正式介绍我给卢子英先生，说我怎样在微生物实验室受到病毒的感染得了脑炎后遗症而四肢瘫痪了，怎样握紧笔杆开拓科学文艺的园地，怎样从延安来到重庆及劝我去香港治疗，和为我募捐等。子英同志留我们吃便饭、桌上摆着三十六样小菜，量都不多，但非常可口，是北碚风味。席间我们谈起抗战形势，大家都很乐观、国共合作，日寇必败，日本鬼子不可怕。子英是开明人士，陶先生提起为我募捐医疗费一事，子英也认捐一笔。

从子英处出来，我远远地瞥见一辆黑色轿车，风驰电掣而来，原来是董老（董必武）和他的随行人员，从重庆红岩村来北碚视察，我能在这里会见他老人家，喜出望外，我们寒暄了一阵，各奔前途。

是晚，我宿在陶先生家，这是一所二楼的小房，实际上

是一个旧碉堡。环境幽静，我睡在楼下客厅里，陶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一位女友，都在楼上，陶先生还请了一位青年陪我，他是育才学校的同学，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在我和汪伦同志告别之前，还和他一起到吴老处（吴玉章），向他告别。

吴老住在嘉陵江北岸，依山傍水，形势险峻。在那儿，我们还见到叶剑英同志，我们四人组成临时党小组。那天上午，天气晴朗，从窗口俯视，江水滔滔，此景，我永远不能忘怀，我们谈了一个上午，我向吴老、叶老汇报陶先生建议我去香港治疗，并为我募捐了一千元路费，他们问长问短，都很关心我的病情，我征得党小组的同意去香港。在临行时，吴老还把他的老友曾育隽先生从香港给他的牛奶罐头转赠给我，也是同志间的情谊。

一九三九年九月的一个早上，我们三人——陶先生、一个青年和我，天一亮就起来了，盥洗后，吃了早点，就从陶先生家里出发，坐滑杆到码头去，登上汽船，风和日暖，不足三小时就到达重庆。

九月中旬的一天，由八路军办事处派来汽车，接我们到青年会暂时住下，陶先生给我安排了房间和伙食，留下那个青年陪伴我，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并扶我练习走路。

次日，陶先生又来告别，祝我一路平安，嘱到香港后即写信给他，

这是我和陶行知先生同在北碚时的一段回忆，永远在我的怀念中。

我与行知在北碚

吴树琴

1938年秋天，陶行知从国外回到香港，意欲回国办三件事：（一）创办香港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教育侨胞子弟抗日救国；（二）创办难童学校，收留在战火中的难童即后来在四川重庆北碚附近草街子凤凰山所办的育才学校；（三）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因未获政府批准，后改办因陋就简的晓庄研究所。该所聘请我为研究员。

1939年，我们到了北碚，得到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热情的照顾，招待我们住在北碚公园清凉亭，记得协助育才学校招收难童的李信慧同志和我住在那里。清凉亭位在火焰山顶上，风景秀丽，空气新鲜，环境幽静，面临嘉陵江边。我们住了月余，日本敌机经常来轰炸，我们就迁居于北碚檀香山桥附近一个经过修整的碉堡内。此处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较近。陶先生、陶宏、王醉霞和我都住在那里。

晓庄研究所的经费很少。陶先生同中国科学社领导商量并得到同意，与晓庄研究所合作，预备研究中国国药。

国药范围很广，从何研究起？经过调查，得知北碚附近，患疟疾的病人较多，当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无法购买进口的奎宁丸，国产的治疟疾药也是非常缺乏，一般老百姓吃不到，买不起贵重的奎宁丸。陶先生关心人民的健康，为了解除人民“打摆子”的痛苦，以身作则和我们一起去访亲

拜友，寻找治疟疾的秘方。经过很久的奔波，他终于找到一张处方，高兴的交给我，要我去试验和研究。同时在育才学校找到一位江卫青工友来协助我工作。陶先生亲自陪我们在中国科学社附近，找到一间破土地庙，经过修理搭起土灶，购买药材和制药的简单设备，我们动手干起来。先将以常山、槟榔、鳖、乌梅等为主的药材，磨碎成粉，煎成药水，分送给附近的穷苦老百姓服用。当时群众的迷信思想浓厚，错误的认为“打摆子”是鬼神和命运的决定。不肯服药。经过我们再三的宣传科学知识，告诉大家得疟疾病的原因，是由疟蚊传染的。一方面要消灭钉在墙上翘尾巴的疟蚊，一方面要服药治病，否则病会一天天的严重起来。经过宣传教育和服药效果，群众就逐渐的相信此药可以治好病，因此从上门送药转变为上门求药。经过一个阶段的试验，证明药水效果良好，药到病除。群众反应，有人服药要呕吐。经过研究，陶先生亦认为服水药不方便，易于引起呕吐，能制成丸药就好了。后来我们就将药水浓缩，制成半流动的药膏，加些辅助药粉，制成了丸药。除给北碚附近患疟疾的病人服外，还送给育才学校患疟疾的病人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一万多人次的试验，我们祥细的登记访问和总结证明此药丸效果良好，就命名为“治疟丸”。后与陶先生等研究，预备进一步扩大生产和试验。但中国科学社突然接到上级的指示，由于经费困难，停止和晓庄研究所的合作。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离开中国科学社，停止了治疟药的试验工作。治疟药能顺利的开展试验，医治了一些病人，和陶先生的细心教育、有力指导和具体帮助是分不开的。为了解决我本人的生活和不脱离本行工作，我就于1941年到了北碚北温泉新亚药厂华西分厂去工作了。